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劫后反思】	关于清华文革反思的感想和思考	孙毓星
【史海钩沉】	我见到的北京地院革委会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	陈永迪
【学术争鸣】	关于文革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张 比
【往事非烟】	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选载）	陆伟国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劫后反思】

关于清华文革反思的感想和思考

• 孙毓星 •

（说明：本文原是一篇在“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稿，谈自己亲历清华文革反思的感想。后来座谈会不得已改在网上召开，结果发言更加广泛而热烈，讨论更加深入，争论也更带有理性。而且，作为清华文革反思的一个特点，总伴随有一些“亮点”出现，推动反思的不断深入，例如樊思清同学的忏悔和校外研究者的参与等等。为此我对原稿作了些增补和修订，作为网上的一个发言。）

24日是母校清华105周年校庆，今年又是文革爆发50周年，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的座谈会是文集《历史拒绝遗忘》的续集，主题是《文革反思与清华》，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几点感想。

我们清华人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一直在反思文革。清华的反思相对于其他院校而言，呈现出几个特点，如集体性反思，两大派互动，参与人数众多（包括两大派之外的），而且有显著的“成果”，即十几本著作问世。而在我看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两派和解共同反思。

当年斗得你死我活，付出过鲜血和生命的两派同学，能够能坐在一起回顾历史，有讨论有争论，一起反思并达成许多共识，这着实不容易，在全国也不多见。回顾历史，清华文革反思和两派和解经历了漫长的、逐渐进展的过程。

可以说，人们对文革的思考早在文革爆发那一刻就开始了，到“9·13事件”林彪折戟沉沙已促使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开始反思。

罗征启老师是文革反思的先行者。正是基于深刻的反思，罗老师在文革结束不久（1979—80年）就代表他们全家对我们这些罪人表示了宽恕，解救了我们的牢狱之灾。他还

鼓励支持我报考研究生，最终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使我到哈工大就学。这件事的影响十分深远，它展现出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和博大胸怀，迈出了两派和解的第一步。

实际上，脱离了政治漩涡走入社会以后，两派同学大多都能和谐相处，对大势的认识也逐渐趋同。我远在边陲还有素不相识的老四同学专门来电来访，同学们相互帮衬的事例也很多。

文革以后，80年代末期，汲鹏同学不记前仇不避嫌疑热情接待了新婚的蒯大富夫妇；到90年代，深圳的两派校友（包括唐伟、张学琛等许多同学）作了很多努力，促成蒯大富与沈如槐握手言和，成为和解的一个新标志，如此等等还有许多事例。

新世纪初，年轻的唐少杰老师作为研究者、沈如槐同学作为亲历者开始了清华人记述清华文革史的新历程（2003—04年）。其后，2007—08年由汲鹏和邱心伟、原蜀育、孙维藩等同学组成“齐凡思”——取“一起来反思”之意——出版了两本“清华文革亲历”，引发了文革反思的一个新高潮。一时间，“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陆小宝）成为清华校友网上的流行语。

2008年初卢沟桥一次有蒯大富、沈如槐、汲鹏、陈育延等参加的小聚会上，老沈说：老蒯你赶紧写书啊。把历史还给历史嘛。当大家得知陈育延还保存有大量日记笔记时（叶公“英雄救美”的一份功劳），也鼓动她写出来。

几年来校友们陆续发表了十多部有关文革的著作（已有张比等转述，恕不重复列举了），直到一年前孙怒涛主编的百万字巨著《历史拒绝遗忘》文集问世。据了解，目前还有一些著述（包括陈育延的）正在写作中。

多年来，清华校友借助现代科技提供的网络平台不断进行交流和探讨，还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比如会前播放的视频所展现的两次（注：原有播放计划）：2009年由李自茂（做东）和陈育延、唐伟等共同发起，网友和两派部分头头干将会聚郭林酒家，是四十多年来的第一次；2011年百年校庆期间，由张学琛做东，陈育延、唐伟等人联络，在卢沟桥聚会2天。大家坦诚交流，气氛热烈，在回顾与反思中有诚恳的道歉也有激烈的争论，有分歧也有共识。

无论在校友网社区、微信群还是相聚中面对面交流，整个反思的过程就是一次民主的生动学习和亲身实践，反过来又提高了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和实施能力。

我觉得，在两派和解过程中，414派，特别是其中的有识之士一直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功不可没；团派中的骨干分子则命运多舛，遭遇过多次整肃，但没有简单地归罪于对立面。大家已经摒弃了简单的争论我是你非，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寻求共识。可以说，文革反思是两派和解的基础，两派和解是文革反思的一项重要成果，而且只有不同派别的和解、不同观点的交融才能将文革反思提升到新的层次。

因而，清华的反思得到外界（高校、学界及文革的思考者）的肯定和赞扬。

清华文革反思的历程漫长而丰富多彩。我有幸参与其中，受益很大，所以要向所有推进文革反思进程的同学、老师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鞠躬）

我个人在文革中干过很多傻事、错事、糊涂事，犯有不少错误甚至罪行。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再一次表达我的悔罪之情，向直接以及间接受到我伤害的同学老师道歉，向你们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鞠躬）

我看到樊思清同学的忏悔，很有感触。出于我个人的经历，使我格外关注这些犯有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同学的命运。我相信还有不少同学与樊思清的心态类似，他们因自己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一直受着内心的煎熬，常常引发自责和忏悔，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公开地表达出来。这样的同学在团派里多一些，在414里也有，在老红卫兵里也有。希望大家对他们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宽松、包容、和谐的环境有助于他们放下包袱，更加勇敢地面对历史。我希望他们晚年的生活幸福平安。如果能像樊思清这样鼓起勇气现身说法地反思，那就要送给更加响亮的掌声。

关于文革反思，结合着清华的实践，想谈几点浅见与大家交流。

1，所谓清华的文革反思“成果显著”只是相对而言，现实的客观条件极大地限制了反思的广度和深度，主观上我们也有认识的局限和学养的不足。

例如：我们的兴趣点集中在清华自身以及与高层的互动上，对外界的文革历程关注不够。不了解各地的工人（如上海）、市民（如武汉、重庆等）、农民（如湖南、广西）和干部、军队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往往在不经意间夸大了清华文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也就限制了观察文革的视野。所以有人评论说，清华文革是“精英文革”（徐海亮《我看清华文革——读“一叶知秋”》）。举例来说，许多人（多为团派）一直为“7·27工军宣队进驻清华为什么不通报蒯大富”而困扰。秦晖老师在为文集写的序言中揭示7·24接见中对蒯超乎寻常的严厉批评，结合当时的全国形势，从更广泛的视角给出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解答。实际上，清华文革只是全国文革大形势下的一个小小局部，囿于清华的小天地会妨碍对文革反思和研究的深入。

再则，我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的工科大学生，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养先天缺失。文革反思乃至深入的研究，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其理论模式、思维方式、治学方法都超出我们大多数人的知识结构。一位知青辈研究者曾当面质问：为什么当年的大学生写不出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来（应该说也不尽然）？我自己在人文科学方面有很大缺欠，我看到的一些理论性分析确有穿靴戴帽，失之肤浅等毛病。不过我相信，清华人凭借自强不息务求甚解的精神，通过博览和思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能够为文革反思和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2，“文革必须彻底否定”的口号喊了几十年，笼统地提“彻底否定”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然而，一遇到具体问题，关系到文革要否定什么，怎样才算彻底，马上就各唱各的调，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观点。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文革？或者说文革如何“定义”。官方的《决议》给出的定义不能解释文革历史，民间早已发出质疑声，如阎长贵先生的《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铁藩学长最近写出《文革定义大家说》等，还有李海文老师的《文革的定义》，已在微信群里引起争鸣。我认为关于文革定义的讨论很有必要，以期找到最大公约数，达成共识，推进对文革的反思。

3，今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登王海光老师的文章，标题是《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彻底反思”这个词语用得好，尽管文革的反思难以轻言“彻底”二字，但可作为一个目标。

我认为，作为文革亲历者的反思有三个层面：还原历史、回顾心路、追根溯源。不言而喻，还原历史真相为第一要务；追根溯源则属于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清华文革历史“还原”得怎么样呢？“不尽人意”恐怕是大家的共识。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难以逾越，但主观上我们总要不懈努力，创造一种环境条件，鼓励大家说出自己亲历的事情。

作为亲历者，回顾、检视自己的心路历程是反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孙怒涛同学写了《良知的拷问》，回顾自己的经历和心路，检讨自己的动机和效果，表述对文革新的思考和认识，从而开启了清华人反思文革的新路径。我受其感召就应邀写了“我的文革心路历程”汇编到这本书里。不过，“拷问”二字份量过重，总感觉过于强调个人的责任，后来在《记忆》发表我的文章时，题目就加上了“直面良知”几个字。

历史总是在主观和客观的互动中形成的。我们的心路历程是史实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而且是目前更缺失的那一部分。现在人们喜欢从文化传统探求文革的起因，那么“文化”的载体是什么？不是书本，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头脑中的思想。把我们的心路历程留给后人，给后人以启迪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据说一位八十年代的学生领袖认为，文革造反派是一群疯子和傻子。且不说他对文革历史的无知，也根本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忧国忧民的“士”的精神。他所缺失的恰恰是这些“疯子傻子”们所具有的理想（尽管可能幼稚和荒诞）和对理想执着地追求。

对亲历者而言，没有对自己的反思，就很难“走出文革”（叶志江），即使把文革描绘得生动热闹，分析得头头是道，总会显露出雕琢的痕迹和涂抹的油彩。

可以说，只有反思自己才能反思文革，只有走出自己才能走出文革。

4，现在文革研究还是内控的禁区，档案连同历史资料一概不开放。那么，怎样看待文革回忆录呢？在国内的出版物都经过严格审查，十分强调政治性，加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隐瞒了一些实情。然而这些作者多属于领导人物，是内幕的知情者，写作时还有查档的便利，所以自有其难以替代的参考价值。然而每本著作，甚至同一著作不同篇章、不同事件的可信度都不一样，是否采信并引用需进一步考证、判断（论者的水平往往体现在此），这里不多作讨论。

民间的回忆录及口述史因历史资料的欠缺，很多内容依靠回忆。时隔几十年，因为记忆的模糊，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偏好，有意无意地隐恶扬善等等，使回忆很难准确无误，所以引用回忆录时同样要悉心判断，尽可能找到文献档案或其他当事人的佐证。

应该强调，回忆录和口述史的上述缺点并不能掩盖它的巨大功用，历史的各个侧面集合起来就更接近它的全貌。有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认为“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因为“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想从他们的过去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

顺便说，年轻一辈的学者和文革史爱好者主要靠阅读档案和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就清华而言，各种资料几乎全部被封锁了）。这类文献的可靠性同样要具体分析。我个人的看法，

包括档案在内的文革资料都具有两重性，所谓“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可能它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但同时含有虚假的成份，在引用时同样需小心谨慎，不能囫囵吞枣。

（作者简介：孙毓星（孙耘），男，天津人，1945年生。1962年考入清华无线电系；1980年到哈工大读研究生。先后在内蒙古、黑龙江、北京工作，担任过工人、工程师、教师、职业经理人等。现已退休，常居北京。）

#### ◇ 讨论帖选登

▲ 王铁藩：近日复读孙毓星的心路历程，方知孙乃28团团长——我一直认为28团即蒯氏井冈山的别称，以示其善战。这样一位悍将竟然生出那么多感恩的柔情、忏悔的深思，真的令人刮目。而更为震撼之处，在于孙毓星的这一切竟然始自罗征启。罗征启，57年蒋南翔的反右悍将，66年工作组的反蒋先锋。他揭发蒋南翔的发言，以蒋南翔在纪念“12·9”报告上如何与彭真勾结，而给了其恩师致命的一击！可见罗也曾有过一副铁石心肠。然而，在文革中至亲罹难后，他宽恕了孙。罗征启与孙毓星的和解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在那充满邪恶虐杀的文革，真的是弥足珍贵，弥足珍贵……我想，就某些具体观点而言，难说他们已经趋同，但这丝毫不减色他们和解的光辉！他们应该成为文革派别由争斗走向和解的楷模！

▲ 朱菁菁：孙毓星对文革反思的分析，是一种先驱者的勇气。尤其是对自己的反思，是考量一个人，一个组织，是否有求真的诚意，是否有强大的心？，是否政治善良。

文革已走到人性恶的谷底，要从深渊爬上来，须颠覆性地反思，如没有政治思想的自觉和激励是很难完成的。

有些人，当初也不是为理想而战，只是随流，所以今天他们也不可能有到位的反思。

有人说，当年左，今天反成右，是其思维方式所致。这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道理，但此论，忽略了大彻大悟和人性本善。

▲ 李海文：反思与和解相反相成，互相促进。清华确实走在全国高校的前面。反思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研究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环境。

▲ 梁颂辉：我们这一代有幸经历了49年之后唯一的两年“有限的民主”（上边有最高领袖），其经验教训非常值得反思。我认为有两点：一、民主必然产生两派（组织起来就是两党）；二、产生两派并不可怕（现在我们两派能心平气和坐下来一起反思就是证明），当年兵戎相见打得你死我活恰恰是非真正的民主（武斗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最高承认我派是正确的）。以此来观察当前形势，就看得更清楚了：又提倡党内民主，又搞一言堂（不许妄议），是走不通的。有不同意见并不可怕，“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 阎淮：清华两派虐待俘虏是人性恶的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残害战友同志，则是制度的体现。

35年前的“两案审判”这类事情揭发了很多。由于没有真正深刻的反思（应该说对制度没有丝毫反思），现在，刑不上大夫了。但是，看守所和监狱中，众多平头百姓的各种奇怪死法，屡见不鲜。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 刘尚培：@阎淮：说得太对了。我非常想不通，为什么从打倒四人帮起一直对反思文革遮遮掩掩？为什么人讳？下面是我前几天在茶馆的类似疑问：“普京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且是骨干。他怎么没有一点点苏共的负面包袱？也没有人拿过去戳他的脊梁骨？马英

九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只是学生，根本没有参加作恶，他不停赔罪，道歉，怎么台湾人依然不依不饶，好像他手上有鲜血？”为什么普京那么容易把从列宁起的一切都翻过去，而且令百姓服气呢？

▲ 王铁藩：阎淮说得好，刘尚培问得精彩——反思的真谛就在于此！

▲ 李包罗：反思文革，有个物极必反的道理在里边。本来是嫌不够左，左过了头，谁也没想到，全搞砸了，只好跑到右边来了。

▲ 罗保林：五十年过去，人们的价值观肯定发生了各种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现在的价值观对历史真相进行解读，并非是对事实基础的“超越”或者漠视。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解读历史，或者以变化了的思想意识、感情去解读历史，是不正确的，是不尊重历史的，是无益的！反思，是在原有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在不讳言、不编造、不文过饰非的情况下，认真地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再根据各人自己今天的价值观去分析，作出个人判断！尽管会出现不同的结论，但依据的事实真相没有太大的差距，这样才有可能相互讨论，争辩，否则鸡同鸭讲！

▲ 陈中平：毓星的文章，体现了清华人执着认真的求实精神。

他对反思文革提出的三部曲：还原历史，回顾心路，追根溯源，以及“摆进去”（尤其是不回避自己的错误）和“跳出来”（视野才能开阔，思考才能深入）的态度与方法，都是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和岁月长期积淀磨砺的结晶。

路漫漫其修远兮，殚精竭虑而求索，庶几无愧于今世与后人矣，孙君壮哉！

▲ 张从：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很多，但有三种态度，一是隐恶扬善，不谈己错，指责对方或把责任推给四人帮和林彪，极力为自己辩解；二是默不作声；三是勇于面对，勇于道歉，自我解剖。显然第三种是正确的，毓星即是代表。北大犯错甚至打死过人者只有前二种，未见第三种，这是对文革反思落后于清华的表现，也是缺乏良知的表现。

▲ 朗钧：罗征敷之死不予追究案的历史背景不应该被忽略。

文革后，死难者家属强烈要求法律追究文革命案的呼声甚高。如果法律追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开来，被追究人数极其庞大。制造北京“红八月”（1700人死亡）的红卫兵也将被问罪。按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话说，追究一旦实施，将是又一场运动。

面对此种局面，胡耀邦提出处置文革人命案总原则，即“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所谓“宜粗不宜细”就是不要追究命案的细节。因为细节搞清楚后，法律上就进退两难了。所谓“水落”就是为死难者昭雪，所谓“石不出”就是不要去确认谁是“凶手”。从法律的层面上看，罗征敷之死不予追究案，对如何处置文革命案有示范作用。诸多红卫兵因“水落石不出”、“宜粗不宜细”而平安无事。总之，罗征敷之死不予追究案反射出来的不是“人性的光辉”，是“党性的光辉”。

▲ 孙毓星：感谢各位群友的理解和鼓励。

@郎钧特别指出“罗征敷之死不予追究案的历史背景不应该被忽略”，体现出作为文史家视界的敏锐和宽阔。这个问题确实值得重视。

不过，我不能苟同@郎钧的结论：对该案的处理（应包括我读研）“反射出来的不是‘人性的光辉’，是‘党性的光辉’”。这种解读不合乎当年的历史，对罗征启老师和胡耀邦总书记也不公平。

我愿与@郎钧（以及感兴趣的群友）仔细探讨这个问题。

这里只想说明，罗案情节清楚、责任分明，有关人员已经过历时十余年的若干次处分（可见本人的拙作），并不符合“宜粗不易（宜）细”、“水落石不出”这两条。

罗征启老师在1979年夏就力主“不予追究”并说服自己全家同意，进而支持我考研。胡耀邦总书记批示我和井岗山读研后有内参报道，强调对犯错误的造反派也要落实政策。罗老师遂成为受过迫害而能够“正确对待”的好干部的典型，此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被任命为团中央书记，当然不久又有了变数。

就我个人的了解，尚未看到本案“对如何处置文革命案有示范作用”。

▲ 张从：支持毓星兄的看法，他和清华大部分文革中犯错误的造反派已为自己的错误受过惩罚，付出了代价，已被追责。罗老师的宽容大度是罕见的特例，他和胡总书记的行为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 王普：我也认同孙毓星学长的说法。罗老师的态度，是他认识水平提升的结果，与过去说的党性有极大不同，也不是受当时政策的影响的结果。

▲ 启正：看了孙毓星同学的文章，有几点感想。

1，文革是强加在全国人民（包括被疑心的广大干部）头上的政治运动，其“触及”人的灵魂与肉体之烈，挑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之尖锐，互斗之狠，仇恨之深，是空前的。中央在毛病死后才敢于宣布结束文革。

在毛死后，宣布“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怎样否定，否定什么，却有众所周知的官方的标准。

一是将首要责任人毛泽东的责任洗得差不多干干净净。并且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将责任全部推到办事人员“四人帮”和林彪的身上。

二是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这个不符合实际，完全错误的理论和实践纲领是对的。但同时不准讲这个“纲”的提出，并且越来越强调的原因和目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三是平反了文革中的及文革前的大量冤假错案，这是好的。但同时保护、掩护了一大批文革中依靠体制依靠文革作恶的人、事，并不准提及。

四是提出重要指导方针“一切向前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好事。但同时又尽力阻挠人们议论政治，尤其是思考和议论文化大革命。

因此官方没有领导人们正确地反思文化大革命，没有依此寻找政治改革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实际上，没有政治改革的意愿。

2，然而民间（包括官员中少数人）对文革的思考，或者叫反思，从来就有，自“913”发生后迅速增多。文革对国家对人民生活一切方面的巨大破坏，使人们越来越看清领袖言行的荒诞乖戾，看清文革理论的虚伪无据，感觉到吃了“二茬”苦，受了“二茬”罪，而其原因不是什么修正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般群众的文革参与热情荡然无存，非议出现，其中不乏一针见血之言。

而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文革中在大、中学校里的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对文革开始了追根溯源的探究。

当初，有良知，或者说有良心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多年的“多媒体”的不真实的世界观的灌输教育，在领导人的竭力号召下，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文革，为打击领导人的有形和无形敌人献身。

然而领袖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真神，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欺世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当这些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发现了“世界观”的破绽，愤怒地发现了极大的骗局时，他们本质上的良知和使命感驱使他们开始对真相的追求，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大脑，“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威胁和高压阻止不了的。

几十年过去，时至今日，经过有良知的人们的努力反思，对文革的真相和本质和历史根源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基本共识。

清华的原造反派两派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其中的头，就基本属于这类人。而为什么能够和解？根本的原因是，经过各自的独立思考，对文革的真相、本质得出了相同的认识。为什么会得出相同的认识？因为事实就是那样，更重要的是本性中良知未变。有了这样的基本条件，才会产生和解的愿望，而在闹派性中对对方的大小伤害造成的对立情绪才有可能经过自我批评和道歉淡化或消除。

3，文革过去几十年了，不是所有亲历者都会反思，也不是所有还想着文革者对文革会有正确的认识。在官方不懈地有意引导下，形成了人数不少的“毛左”派，文革崇拜派。他们对于官方的现实政策有时看来是有很大大意见的，但是他们是官方用来平衡以上叙述的觉醒派，即官方眼中的右派的最重要工具，因此，暗中培养着，鼓励着。

“毛左”派的头面人物一般是从小就良知缺失的人，如当初在北京执行杀害无辜 1700 多人的人，执行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兴屠杀的人；或者是愚昧不可救药的人，如司马南，孔庆东等；或积极卖身邀赏的人，如周小平等。

4，对文革的反思成就很大，但还远没有完成。没有对文革的彻底的全面的反思并昭示于天下，将来我们的后代们读到的历史对文革的描述就会是荒唐可笑，贻害苍生的故事，有意缺失中又夹杂着无中生有，大关节处黑白颠倒，因果混淆。

永远不要指望有什么为你准备着的，真实的完备的“档案”，在什么时候为你“解密”“公布”。凭什么要这样做？

▲ 蔡新平：揭露和批判毛思想的根基的谬误，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对文革的反思最终是对毛马理论思想的反思。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 50 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 年 5 月

~~~~~

## 【史海钩沉】

我见到的北京地院革委会批斗朱成昭 and 关押叶向真

• 陈永迪 •

◇ 许多人不知道朱成昭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是御封的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北地东方红还有一位比王大宾更有思想深度更具“领袖”风范的负责人——朱成昭。1967 年 3 月以前，朱成昭一直是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如果说三司有“司令”，朱成昭就是。朱的父亲是新四军老革命，时任上海市建工局副局长，随着运动的深入也受到冲击，导致朱成昭对文革的看法随之发生改变。

在朱成昭思想转变过程中，叶向真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是东方红的一把手，他的重要言行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披露出来、汇报上去。朱对文革的不同意见暴露后，中央文革派工作人员王广宇到地院传达了陈伯达给他的一封信，陈伯达警告朱不要掉到茅厕里成为又臭又硬的石头，赶紧悬崖勒马！1967 年 2 月 4 日在地院东方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朱成昭借检讨之机，将他对文革的看法系统地归纳为“八大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归结为四句话：“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1）。在私下里召开的“秘密”会上，朱成昭对文革还有更尖端的想法，他说：“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2）



“八大观点”表明朱成昭并未“悬崖勒马”。不知出于何目的，这封打击朱成昭的信中央文革并未要求公布，却被朱成昭公布了。朱主动将自己置于中央文革的对立面，成为被批判的众矢之的。此后，我在大字报区看见3月4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首都红代会工作人员的报道会上的讲话，戚本禹说朱成昭“刚愎自用”，应该“闭门思过”，从此朱成昭走上了不归路。

1967年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成立革委会，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成为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地院革委会主任。

限于认识水平，我当时并不赞同朱成昭公布的“八大观点”，认为文革的主流是好的，中央文革是正确的，对群众运动要像大革命时期支持“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说“好得很”。虽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只觉得他太偏激，看问题主次不分，把缺点看大了。

#### ◇ 朱成昭给我的第一印象

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只是个小角色，甚至角色都谈不上，仅为普通一员。东方红总部和核心组的成员都是1966年6月份反对工作组的“老造反”即参加“6·20游行”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那时我和一些同学还在山东胜利油田毕业实习。待到7月初回到学校，工作队正手握“尚方宝剑”——薄一波的批示，批示将“6·20游行”打成“反革命事件”。工作队趁势将参加“6·20游行”的积极分子和对工作队持不同意见的同学和教职工打成“反革命”，这些事件都和我们毫无关系，因此我们班没人被打成“反革命”，当然也无缘“老造反”。虽然没有参加对工作组造反，但对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同学有一定同情心，有一些“反革命”在工作组进校前还是党团员、班干部，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对当时批斗院长高元贵，我也有看法。工作队传达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的话：“高元贵骄傲自大，身为地质学院院长，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这也是打倒的理由？实在荒唐！

我第一次见到朱成昭，是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大辩论。工作队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代表工作队先作检讨，听完检讨后，保守的“斗批改”大叫：“通得过！”造反的东方红则齐喊：“通不过！”双方围绕工作队的是与非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东方红在发展组织过程中吸收了不少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加入，“斗批改”抓住这一“软肋”，抡起“血统论”的大棒，对东方红的发言人逐一盘查“家庭出身”，稍有瑕疵就打成“狗崽子”、“阶级敌人”，轰下台去。

就在东方红快要撑不住时，朱成昭登台了。他高大的身躯、威武的形象、雄辩的口才，加上硬梆梆的家庭出身，挡住了“斗批改”的攻击狂潮。朱成昭大气磅礴，上台先背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接着痛斥工作队残酷迫害学生的罪行，声泪俱下句句在理，博得台下一片掌声。东方红的同学纷纷上台声讨工作队，有“斗批改”的同学当场表示要加入东方红，还有受感动的外地学生也表示要成为一名“东方红战士”。此后“斗批改”节节败退，东方红大获全胜。

从此朱成昭在我心中留下了英雄的形象。

#### ◇ 批斗朱成昭大会上的闹剧

叶向真，叶剑英元帅的女儿。文革时是中央戏剧学院文革小组组长、中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负责人。不知何故她也加入了造反的队伍。在一次中央文革召开的会议上，江青介绍她认识了朱成昭〔3〕。两人观点相近，交谈甚欢，从此你来我往一发不可收，终于擦出爱情的火花。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凭着她掌握的高层信息，再加三寸不烂之舌，很快使朱成昭折服。1966年底，两人的关系已迈入火热阶段——据东方红办公室主任伏庆是回忆：“有天晚上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告诉田春林〔4〕，如果田再干涉他与叶向真的事，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5〕

在朱成昭“闭门思过”期间，东方红没有对他采取约束措施，他仍可以自由活动。7月初，朱成昭决定南下，想去上海、广东散散心。这一散心引起了高层的注意，给朱成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朱成昭离开学校去了南方，很快成为校园议论的热点，学校大字报每天都有他的传闻，有说他和叶向真双双逃到广东，企图叛国投敌；有说他们躲到广州市长曾生家里，因为叶剑英和曾生是老上下级关系，叶向真小时候在广州长大，与曾生亲如一家；有说周总理知道叶、朱跑到广州，立刻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亲自去捉拿……。对这些传闻，我们都很感兴趣。也有人同情朱成昭和叶向真，为他们的命运捏把汗，担心他们凶多吉少。

北京的夏天，白天炎热难熬，晚上凉风习习。我们都习惯于晚饭后去北五楼前的大字报区游荡。一天傍晚，学院的大喇叭突然播出一条爆炸性消息，说已经将反革命分子朱成昭捉拿回校，地院革委会决定当天晚上在学院大食堂开批斗会。〔6〕

此消息在学院炸开了锅，大家都兴奋地向大食堂涌去。学院大食堂兼有礼堂的功能，是全校的活动中心。我们曾在大食堂聆听过谢觉哉的报告，欣赏过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的演奏，观看过庄则栋与李富荣精彩的乒乓比赛……当然也批斗过不少“走资派”。大食堂东西朝向，西边的主席台兼舞台，可以容纳上百人演出。舞台下面是宽敞的大厅，没有座椅开会时要自带板凳。

批判会虽然是地院革委会召开的，但不像是正规的批判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拉横幅，没有设立主持人和贵宾的专门座位。在主席台南北两端拥挤着想要近距离观战的人群，只有中间留出一个小小空间，供批判人发言与被批判人挨斗使用。

我特意挤到主席台南端可以观察全局的位置，只见食堂大厅里陆陆续续进来很多人，黑压压一片。地院已实现大联合，表面上没有人公开拉出队伍唱对台戏，暗地里不同观点依然存在。有拥朱的“啃猪蹄”派，有拥蔡新平为首反朱的“喝菜汤”派，有拥王大宾的“杀猪切菜拥王”派。

过了一会儿，地院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宣布：“把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押上来！”

只见一群“东方红战士”将一位大汉从后台推了出来，此人正是这些“战士”们曾经的“领袖”朱成昭。朱成昭被两人架成“喷气式”，一人用手掐着他的后颈窝往前推，旁边还簇拥着不少人。被批判的朱成昭比押解他的人高出大半个头，胳膊被反拧着，身体依然直立，脸上充满不屑的表情。那气势与我在8·24辩论会上见到的朱成昭相比毫不逊色。这滑稽的场面使我联想起电影里常见的典型英雄就义场面：共产党员形象高大、昂首挺胸、戴着脚镣手铐在前面走，国民党兵矮小猥琐、端着一杆破枪跌跌撞撞在后面跟着……朱成昭不停地将头拧向后方，拼命地反抗着，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白色圆领衫已被汗水湿透。

朱成昭被推到舞台前沿中央后，押解人松开了手，朱成昭将头高高地昂起。台下的群众见状，齐声大喊：“低头！低头！低头！”刚松手的押解人又重新拧住朱的胳膊，企图制服他，舞台两边也有人上去助阵。朱成昭拼命抵抗着，就是不低头，台上扭成一团。

在昏暗的灯光下，猛然窜出一个黑影，上去就抱着朱成昭的头将身体吊在他的脖子上，用尽全身力量往下压……朱成昭终于被按倒在地上了。我想，朱成昭再也挣扎不起来，只能趴在台上接受批判了。突然，朱成昭甩掉压在他身上的人，像弹簧一样蹦了起来！台下立即又爆发出“低头！低头！低头”的声浪，围在朱成昭身边的人又将他按住。

这时有人上去向朱成昭劝道：“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请罪！”在那个时代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朱成昭同意了。人们松手让他站起来，朱成昭转身朝主席台后（西边）的毛主席像微微低头，屁股向东，对着台下的群众——这姿势明摆着是羞辱批判他的群众。我们都看出问题了，但是如果强迫他将身体转180°，就会将屁股对着毛主席像，这也是大不敬。因此直到批判会结束，没人敢纠正他的姿势。

此后批判者一个个上台发言，我已经忘记他们说了些啥，无非是叛国投敌、罪该万死之类。散会后，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朱成昭不屈的身影以及他把屁股对着群众的场面，心想：这小子真厉害，有一手！

#### ◇ 叶向真在地院遭到游斗

批斗朱成昭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在大操场西边的马路上，我看见一群人正拥着一个什么人往大操场主席台方向走，在主席台北侧停下来。人群围成一个小圈，待我挤进人群里，才看清楚被押着的是一个瘦小的女子，年龄比我略大，面黄肌瘦像没吃饱饭的农妇。此时她正被反拧着胳膊，一般年轻女人的胳膊都是浑圆的可这小女子的胳膊瘦得像竹片，我真担心这“竹片”再用一点劲就会被拧断。我好奇地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呀？”有人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向真！眼前的这个女人穿一件浅色短袖衫，瘦骨伶仃，面目清秀，脸形很像叶剑英。人群中爆发了口号：“打倒叶向真！”“叶向真必须老实交代！”“叶向真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有人冲着叶向真吼道：“叶向真！赶快交代叛国罪！”叶小声说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不管人群怎样喊叫，她只重复这句话。也许押解的人只想把叶向真游斗一番示众，没有在此地开批斗会的意图，在“打倒叶向真”的喊声中，她又被押着往北边大字报区的方向走去……

据叶向真在首都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春风得意时见过她的校友讲，叶向真是个美女。人一倒霉，美女变丑，所以在她被地院游斗示众时，我见到的她那形象与美女大相径庭。

#### ◇ 我当过关押叶向真的“看守”

叶向真在地院关押地点有两处，先押在南五楼，后转移到学十二楼。据聂树人在《地质东方红史》第二部分“叶向真的命运”一节里引尚凤生的话说：“叶向真从广州被押到地院后，关在南五楼224室。我曾看守叶向真一个星期，后来不看了。南五楼是男生宿舍，没有女厕，叶向真得去楼前桃园中工人的简易厕所中如厕，曾引起误会。”据时任地院革委会常委的朱德渝回忆：“叶向真关押在南五楼二层西头勘探系三年级红色尖兵战斗队处，她住一个小宿舍。我曾一天晚上开会回来去南五楼二层西头，准备上卫生间，可卫生间门口有位男生站岗，告诉我不要进去。”

有一天测井班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一个“秘密”，说叶向真关押到了学十二楼的二楼。我当时很吃惊，没想到帅府千金关押在我们住的楼上！为什么把叶向真从南五楼转移到学十二楼？作为东方红的普通一兵，我只能这样猜想：南五楼和北五楼（朱成昭、王大宾住在北五楼）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两栋男生宿舍楼，两栋楼结构大小相同，南五楼的宿舍房间很大，大的可住25~30人，小的也要住8人，楼道很长，住的人也很多，不适合封闭关押叶向真这样重要的敏感人物。其次在南五楼腾一个房间至少要迁走8人而学十二楼的二楼是研究生宿舍，腾一个房间只需迁移4人，这可能是把叶向真转移到学十二楼的重要原因。

又过了几天，班上东方红的负责人把我叫去，要我到二楼去当看守。看守有几人已记不清了，反正大家轮流值班。在二楼的过道口摆了一张小课桌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记事本。我们的任务是阻止无关人员随意闯入，就是经过总部批准的人也要登记。当年看守叶向真分为外勤和内勤两拨人，我们是外勤。在我的印象中，内勤有女同学，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完全没有记忆了。审问她的人是学院革委会专案组的，吃喝拉撒全由专案组的人负责，我们不能随便进出她的房间。晚上不值班，将二楼的过道门上锁，我们就可以回宿舍睡大觉。

整个关押期间，很少见叶向真出房间，估计大多数时间在“闭门思过”、写检讨。她在学十二楼关押的时间不长，大概有20天左右。有时内勤把叶向真从房间带出来，去了哪儿我也不关心，因为不是我的任务。

◇ 我有幸拜读过叶向真的检讨书

在关押期间的某一天，也是那位测井班的同学（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拿给我一份油印件，标题是《我的检讨》，检讨人署名“叶向真”。同学告诉我抓紧看，这份检讨书不能外传，看了还给他。

我如获至宝，赶紧读起来。印象很深的是，叶向真那份检讨油印件的字刻写得很漂亮，标准的楷体，字体大，字间距大，所以看起来很悦目。可惜当时没有将重要内容抄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细节都淡忘了。读叶向真检讨的第一感觉，是她的文字功底极好，那份检讨写得像一部有关叶、朱恋爱史的文学作品。她写了怎样认识朱成昭的经过，文革初期叶向真和刘诗昆已经离婚，认识朱成昭时已是单身。俊男靓女，干柴烈火，着火很正常。她向朱成昭说过叶剑英的一个忧虑，说毛主席信任红卫兵，现在把老干部、老将军都打倒了，将来敌人打过来，蒯大富能带兵去打仗吗？检讨中还交代，去广东是她的主意，因为她从小在广州生活，对那里的人和环境都熟悉，去那儿散散心，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什么“叛国投敌”想都没有想过。

叶向真的检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这样一段（大意）：

她承认朱成昭的“八大观点”有她的影响。朱公开宣布“八大观点”后，被中央文革责令“闭门思过”，心情很苦闷。为了安慰朱成昭，叶向真邀请他到叶帅城里的家去住。那段时间他们特别幸福，在一起不谈政治，读世界名著，读普希金的诗……双方都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乐不思蜀”。叶向真高兴时还给朱成昭弹奏钢琴。叶宅俨然成了他们的“世外桃源”。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正下着大雨，朱成昭患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叶向真接到一个电话，是叶帅打来的。叶帅说，听说我们家里住着一个反对中央文革的人，马上把他赶出去！叶向真接到电话后哭了。她舍不得朱成昭，但是父命不可违，只有把真相告诉朱成昭。朱听后也流了泪。不过朱成昭毕竟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他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在倾盆大雨中走出了叶宅。叶向真望着朱的背影，伤心地哭着……

叶向真这些充满感情的生动叙述，我看了几遍。因朱成昭在大雨中带病被赶出叶家的情节，具有精彩的戏剧性而印象特别深刻。叶向真的检讨策略很高明：以情动人，蒙混过关。她的检讨用大量篇幅写过程，写情节，真正的“思想认识”很少，这就是她的高明之处。她毕竟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对人的感情世界比我们了解得深透。我就是不知不觉被这检讨打动的。

看了叶向真的检讨，充满了对他们的同情。上面说叶向真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情调腐蚀革命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必须坚决批判。她的检讨书很快被收回了。

叶向真在学十二楼只关押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就被带走了。去了那里，不得而知。从8月开始传说要将66届的学生毕业分配，在外地“逍遥”的、回家躲派性混战的同学纷纷回到学校，盼望早日分配工作，拿到工资，还有带着未婚妻回学校的。于是，宿舍又开始满员了。叶向真被转移走当然也还有其它我不知道的因素。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人，不排除中戏要批斗而把她接走了。像叶向真这样敏感的重要的人物，关押在何处，也不是地院革委会左右得了的，决定她命运的更多是中央。

听说叶向真后来被关进了监狱，直到林彪事件后，1972年才出狱，后改读医大，在301医院当外科大夫。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根据曹禺的话剧《原野》改编的电影颇有影响，后来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凌子”就是叶向真，她又重操旧业了。再后来在电视上看见她接受采访，侃侃而谈，但对文革中的那些经历却讳莫如深。

不知她当年那个检讨书如今是否藏在哪个档案馆里。

注释：

- 1，《昨天》2017年11月30日第101期（增刊），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4·伏庆是专辑
- 2，《华夏文摘》（增刊）2012年5月21日第680期，张蕴章：首都红卫兵三司司令朱成昭
- 3，张运钧、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2017年7月30日第95期
- 4，田春林，当时是地院东方红核心组成员，与朱成昭同为地院东方红的发起人。
- 5，《昨天》2017年11月30日第101期（增刊），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4·伏庆是专辑
- 6，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史》第二部分第十四章，朱成昭走向灭亡：《新东方红公社宣言》的风波过后，王大宾主持召开常委会，说要研究批判朱成昭的反动观点，以肃清他的流毒。常委会上，大家对召开批判大会没有异议。

~~~~~

## 【学术争鸣】

关于文革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 张 比 •

文革，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于公元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距离它的结束，已经42年了。尽管官方近年来回避和打压，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没有停止。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部分，以较大篇幅系统地论述了文革的性质、起因和后果。在当时，达到了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政治上眼前利益的考虑，《决议》的内容显然还有种种缺陷。37年过去了，对于《决议》中有关文革的论述，需要有修正和补充。

## 一、关于文革的起因

《决议》写道：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

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以上，《决议》对文革的起因和性质都进行了阐述。关于文革的起因，《决议》是从毛的错误理论入手来阐述的。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而实际上这条路线并不存在。“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简言之，《决议》认为，文革是因为毛认为存在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存在着一批走资派，所以发动群众开展了斗争。

《决议》的分析也就到此为止。如果毛的出发点仅仅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以下现象：

文革中为何被斗争迫害的人如此之多，除了走资派，还有：

- 1）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失败者，如陈昌浩、李立三、王稼祥、彭德怀、习仲勋等。
- 2）原来与共产党合作过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反右时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也包括反右时的积极分子吴晗等。
- 3）大量的知识分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在国民党失败逃跑和共产党取得政权时选择了后者。也有许多从海外回来报效新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曾在回国后一度受到礼遇。
- 4）大量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他们被打死打伤，抄家，进入城市的被遣送回原籍。其中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包括了原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有一般历史问题的留用人员。其中的右派分子，包括已经摘帽和未摘帽的，有的“顽固不化”者如林昭等，则被处死。
- 5）大量的原资本家和小业主，他们被抄家、殴打，定息被取消。
- 6）大量的普通群众（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抓516分子）。

也无法解释，除了对人的斗争外，还开展了“破四旧”行动，毁坏大量文物，烧毁大量书籍。

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让城里干部和其他人走“五七道路”，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还是毛自己说的更清楚：文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几十年阶级斗争的继续，而不仅仅是反对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其斗争的范围更广，历史起因更深远。就其斗争的打击面来说，不仅是小范围的党内斗争，而是类似“焚书坑儒”的毁灭文化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行为加上类似朱元璋、张献忠等滥杀无辜的镇压行为。

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杀AB团、肃反，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残酷的党内斗争一直延续下来。从1949年后的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始终不断。而在这些斗争中幸存的人，都被认为是被走资派保护起来的牛鬼蛇神。土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未被打杀的人，没有完全没收的财产，在文革中又一次被清算。抄家、打人、遣送回原籍，从1966年的8月开始，受到了最高层的指使、默许和叫好。也就是说，1949年后阶级斗争还没有消灭的有产者，在文革中再一次受到毁灭性打击。有知识的人与有资产的人一样，被当做资产阶级，遭受沉重的打击。有“历史问题”的人，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这次不讲政策了，一律残酷打击。总之，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可见，说文革是反对修正主义，显然是太不够了，文革实际上是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对过去没有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的一次“补课”。毛不仅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四清时对刘少奇“憋了一口气”，对历史上反对过自己也始终耿耿于怀，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对历史上和自己合作过的民主党派要“过河拆桥”，把他们彻底赶下政治舞台。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过的人，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总之，对没有被打垮或已经被打垮的实际上或潜在的反对者，一律不再施仁政，而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江山”代代红，永远红下去，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的稳固和后继有人。毛自己说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就清楚地表明了其目的是多方面的，是大规模的，是全局性的，不仅限于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

从毛的一贯思想和文革中的表现来看，从对516通知、五七指示的深层解读来看，毛发动文革的国内政治原因是要夺回失去的部分权力，打击一切反对者，巩固独裁统治。社会原因是要建立封建性质的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像红色高棉那样取消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否定社会分工，追求绝对平均主义。其国际原因则是要更加坚决地反帝反修，争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反人类、反历史的大倒退行为。

而毛为何有这样的目的，自然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知识结构、性格特征有关。据文化学者王学泰的研究，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一批城乡游民，他们不事生产，游走于社会边缘，其中的小知识分子由于科举的取消，出人头地的途径只有造反一条路。他们是江湖习气十足的流氓无产者，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是一股极强的社会破坏力量。毛、江青、康生、张春桥之流就是这样的人。而毛通过阅读大量旧书和支离破碎的马列学说的学习，尊崇秦始皇加马克思，把独裁专制的帝王之术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结合起来。在未取得政权以前，已经在打压异己、内部残杀，利用他人，牢记个人恩怨等方面运用得十分纯



熟。所以，在他的晚年，面临着大权旁落、接班人危机时，在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十分遥远的情况下，决定孤注一掷，开展大斗争、大破坏，做出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行。

## 二、关于文革的性质

《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定性，将文革定性为“内乱”，其定语有三个，即“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

第二个定语，即“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已经有多数论者予以否定，认为不是被利用，而是利用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这里不再详述。

第一个定语，“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基本准确，但不够完全，一个人就能发动，有些不够，应当是党内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想的总爆发，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必然结果。

第三个定语“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内乱”二字。

“内乱”使人想起“内讧”，想起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内斗与自相残杀。

如果仅从党内来看，毛刘之间的内斗，确实很像洪杨内斗，但文革进行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大，远远超过了洪杨之乱。

文革不仅是毛刘内斗，文革也不仅仅是内乱。

内乱往往是两方或几方的争斗引起的，如北洋军阀时期的军阀混战。

文革实际上在党内有两方争斗，开始时毛刘、后来是毛林，再后来是毛邓。但林是为了反刘启用的，邓是为了遏制周，平衡党内不得不启用的。主导方都在毛，想用就用，想斗就斗。

但作为党内外一起发动，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就不仅仅是内乱，现象是内乱，本质上是一人控制、操纵，以党、政、军的力量，外加临时吸收的投机分子（阶段性的）组成了极左势力，对反对者和无辜者的大镇压、大迫害，对社会文化的大扫荡、大破坏。

这样说，是因为文革基本上不是双向的斗争，而是单向的打击迫害。被打击者，主要是社会的进步力量（如党内的开明派、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和一些底层无辜者（如黑五类子女、知识青年），而打击者，则是社会的反动力量。

由此，对于“内乱”之说，应当修正。

文革的性质应为：由以毛为代表的专制主义者发动领导，并利用了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集团，给中国社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对社会进步力量和无辜者进行镇压的政治大迫害，对中华文明和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和历史的大倒退。

### 三、关于文革的后果

《决议》中叙述的文革中被打击以至死亡的人数，对国民经济的破坏，都是客观存在的。以下想从另一个角度讨论文革带来的后果。

#### 1，文化的毁灭以及人才的断层

文革中焚书坑儒，打击知识分子，破坏文物，学校停课，大学停止招生，大中小学校舍设备被破坏，宣扬“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各级革委会主要由文化程度很低的军人和工人农民组成。10年之内，全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下降，高等教育人才断档。虽然在10年后恢复了高考，大学开始招生，但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严重结构问题，而知识和学术的延续是最怕断档的，耽误的不仅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

#### 2，国民道德的沉沦

文革中全民学红宝书，高喊三忠于四无限，造成极大的个人崇拜，至今没有消除。10年中，人们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投机取巧者弹冠相庆，忠直之士灾难临头。因而，或学会了投机钻营，或远离政治，明哲保身。人们看惯了响应号召者吃亏上当，撒谎耍赖者占了便宜，看惯了吹牛拍马打小报告者青云直上，老实肯干者总也摊不上好事。于是，传统的仁义道德被抛弃，损人利己的行为比比皆是。如今的不守规则，制造假货，都与此有关。文革后期军队介入地方，“走后门”等特权行为流行，为争取个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说，文革造成的国民道德的沦丧，也将影响几代人，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疾首的。

#### 3，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也曾出现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但是，对毛的专制主义本质没有清算，后来的实际掌权者，主要是被毛打下去的原来的老干部。他们既对领导体制做了一些修补，又要维护一度失去的既得利益。各级领导人接受了文革的正反教训，对群众中民主自由的要求更加严厉地打压。于是，社会治理结构出现了复杂的新变化。

##### （1）红二代登上历史舞台

毛发动文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由于民粹主义的倾向，他曾试图在出身底层的工人农民中培养接班人。文革后，新的领导人看到了接班人问题的紧迫，采取了培养第三梯队的做法，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标准，也就是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可是，经过那场政治风波后，充满危机感的元老谁也信不着了，提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可靠”。于是，红二代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其实，这和毛一度企图建立的“家天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一脉相承。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专制主义的加强，实际上是其虚弱的表现。

##### （2）高度集权有所削弱

尽管毛曾经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尽管他的继承人也在放权收权的实践过程中犹豫不决，尽管还有人又企图重弹“党是领导一切的”老调，但事实上文革后高度集权的体制还是有所松动，不断被削弱，而各地，各大型企业的自主权则增加了。这与文革时期的混乱，中央威信降低和实际控制能力的下降有关。

### （3）民主诉求方兴未艾

经过文革，党内阴暗面确实有所暴露，被运动的群众也在大民主的口号下争取自己的切实利益。文革结束，国门开放，新的思潮涌入，党内外的民主诉求都在抬头。实际上，文革这种大镇压、大迫害过后，总会引起反弹。既然在文革中还有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这样的民主斗士，在专制主义有所削弱的情况下，在经济上出现了中产阶级之后，民间的民主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尽管民主宪政的路还有很长，但希望已经出现。

### 4，社会动乱的隐患

2012年前的3年，在中国西部的重庆，“唱红打黑”一度盛行，人们以为文革又来了。由此看出，文革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仍然存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曾经警告，要防止文革再次出现。10年文革，在许多人的心里，那是造反派的盛大节日，是毛左的政治梦想。领袖崇拜，无政府主义的狂欢，仇富心理，这些都是新的动乱的思想基础；而贫富差别悬殊，社会分层明显，缺乏减压器那样的时候中介组织，则是可能产生动乱的社会基础。文革未被彻底解剖，彻底否定，尚存的文革中的获利者怀念他们过去的好日子，在各地频繁活动，而文革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或者莫名其妙，或者以为是真正的革命，在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

### 【往事非烟】

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  
——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岁月（选载）

• 陆伟国 •

## 五，造反有理（校内“文革”前期）

### 1，狂潮骤起

#### （1）大字报

1966年的春天，我们班住在人民大学城内分部（铁狮子胡同1号，原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去有关工厂搞工业统计的实践教学。但是越来越激荡的革命浪潮，使得这样很革命的实践教学也搞不下去，没来得及再去商店搞商业统计的实践教学，就回海淀的校本部停课闹革命了。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革命的气氛更是沸腾了，我们就像掉进了一口翻滚喧嚣的大锅。整个校园是一派极左势力所津津乐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景象：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各种各样关于领导人和国家大事的、以往小小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有影没影的传言；到处是兴奋的人群，真的以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学生们纷纷从北校门去北大、清

华看大字报、听站在板凳上谁都可以表演一番的即兴演讲。有的老师还在校门口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啊，不要忘了1957年的教训啊。

关于聂元梓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北大是当时事业单位社教运动的试点，这期间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与校领导陆平等人发生矛盾。从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队进校，直到1966年1月在国际饭店开会勉强结束，也没解决。聂元梓原先是在哈尔滨，跟前夫离婚后，在她哥哥聂真（人大副校长）的联系下，1964年调入北大，任经济系副主任。其实，聂元梓也就是个初中文化，这里面就没有名堂？第二年又当了哲学系总支书记，不料却和校领导陆平等人扛上了。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出中共中央理论小组北大调查组，组长是康生老婆、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聂在曹的肯定与支持下，于5月25日下午2点在北大大饭厅东墙贴出了这张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彖、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康生派人专程将这张大字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立刻在大字报上做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于是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想插一句的是，连聂的第二段婚姻，也是在康生的要求下而解体。1966年，聂奉康生之命，与结婚不到一年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吴溉之离婚）

面对渐渐决口的堤坝，系里传达了市委的精神，要同学们“心要热，头要冷”，就是既要有革命热情，又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轻信，不要受蛊惑，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要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些话，本身都是对的，我是听进去了，以至于有江青、康生这些人出席的北大、北师大的大会也没有去。而老师的这些话，后来就成了压制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也有同学表现出了与往常不一样的热情。因为系里不提倡大家去外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就有些犹豫了。这时，有位平常挺沉稳的同学起来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使大家感到有些突然。这大概是革命的浪潮，已经涌进了他的心里。

那些天，我们倒是很正常地去邻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内容大多是批判邓拓（人民日报总编、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三家村札记”（那是他们三人在《前线》杂志上合作搞的一个针贬时弊的专栏，被极左势力选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突破口，与此相连的还有批判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的“燕山夜话”等。）以及他们本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地有一些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这些。尤其是6月2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把北大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党”，号召革命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这些话，在当时把我们“彻底”地震惊了。解放都十七年了，怎么又冒出来“假共产党”了呢？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啊！尽管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相比，但在当时也是足够的震撼了。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的一个专栏，三个作者合署笔名为“吴南星”。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集整理，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

夜里也歇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工作组该不该派、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但还是认真地讨论着，那可是在关心国家大事啊。那些时日，整天屁颠颠地跑来跑去，不用上

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觉得有种热闹的气氛。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难道文化大革命真就是这样的节日？大家还真以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到来了，一场能使人们和社会更加革命的革命到来了。就像前不久一位台湾友人跟我说，那时他还是个中学生，听说大陆发生了文革，又不用上课，又能打老师，真有意思。大家的理解都还很天真。

在有大字报之前，大家都写过一些批判稿，批判三家村，批判旧市委，批判校领导，有的在班上交流，有的交给老师。我写了份批判稿，最后难免要写几句口号。我写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有位老师看了后，把它划掉了，说是没那么严重吧。其实这两句口号不是我发明的，当时已经有了。这位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也可能是注意到了但不赞同。一个月之后，当运动更激烈、斗争更严酷，批判稿变成了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领导干部和老师们被纷纷拉出来批斗时，有同学想起了这件事，说那个老师至少是在压制革命。我忙说，大字报上这两个口号都有，没划掉，让这位老师少了个事。

然而没几天的时间，批判的对象，渐渐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教育部往下沿伸，指向了学校，指向了系，甚至指向了老师。为了表示我们也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为了帮自己的老师过这一关，我们班也在新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组织了对辅导员和系办几位秘书的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个走上讲台“义正词严”。我也发了言。发言前，对那发言稿是字斟句酌，讲重了，怕伤害到老师；讲轻了，又怕说是“走过场”。会上，老师们也心领神会，很是配合，一个个表示要“认真改正”。会议结束时，我们请老师们先走。老师们也对我们连连点头。低年级的学生要厉害一点，64级的辅导员邵汉青老师身怀六甲，也照样站在教室里被同学批判。当然，这些比起那些中学生对老师的批斗，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人民大学出现大字报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校内大量出现大字报是在5月24日，比聂元梓的那张还要早一天，主要是针对北京市委、中宣部那些的。6月2日，在苏家坨前沙涧的哲学系11名学生最先贴出针对本校的大字报。因为远在郊外农村，当时校内并不知道。校内出现针对本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是6月4日由经济系教师罗肇鸿所写，题目是“向我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开火”。6月7日，哲学系教师姚中原贴出比较有影响的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8日，经济系研究生江春泽等在红二楼西侧贴出批判经济系主任宋涛的大字报，这是最早点名批判校内领导的大字报。6月11日上午，语文系研究生马畏安贴出批判副校长孙泱的大字报。下午，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师麦农等二十九名教工贴大字报表示支持。这是最早点名批判校级领导的大字报。随着对校内领导批判的开始，分歧也就出现。6月14日，函授学院的徐一志等五人贴了批判我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结果，第二天他们几个就被保郭观点的人拖出来斗了。

光看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行啊。怎么显示自己也投身政治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同学们也开始写大字报。写什么呢？怎么写呢？这是贴出去给大家看的，比起教室里关起门来的发言，就更得慎重了。既要表现出革命的“战斗力”，又不能真的伤了老师，真的是又一番搜肠刮肚、费尽思量。这类为了应时应景的大字报，当时也是占了一大部分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可是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是不管写毛笔的那些规矩，把毛笔当钢笔写，也不抬胳膊，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

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戈泊老师写了份大字报，长达七页，对他早年的一篇在苏联留学时的副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批判”，但没有任何政治性帽子。因为带有点“学术性”，班里同学还说写得不错。戈老师是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难得有的“偶像”，留苏高材生，英俊魁梧，还会唱一手好歌。后来有次出差途中偶遇戈老师，我提起了这件事，说：“真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写了你的大字报”。戈老师笑笑说：“是吗？我怎么没见过？”或许，他是不想叫我还把这事放在心上；或许，也可能真的没见到。因为那时大字报比现在网上的发帖跟帖还要多，有的不到一小时就被新的覆盖上了。所以，有的还特地注上“请保留三小时”、“请保留四小时”之类的字样。没有点“要命”的内容，是注意不到的。当然，我今天仍然要为此向戈老师表示真诚的歉意，因为这毕竟不是开玩笑。

## （2）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极左势力当然不会让运动就这么温良恭俭让地走下去。渐渐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个大事，是五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知道的时候已是6月4日，报上公布了那次会议决定的改组北京市委的名单，成立了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书记处书记：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六月中旬，北京新市委向各单位传达了也是那次会议上作出的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这被称之为“文革”的第一战役，之前的批判“三家村”还算不上。

当我听了这个传达，才知道天色真的变暗了。心里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里其他那么多人是在干什么吃的呢，连这个也看不见吗？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提拔自己干部的呢？又不是像小偷悄悄地藏个东西掖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这个高位是大家都在仰望着的，是怎么窃到的呢？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随着“文革”的开始而开始了。

尤其是传达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心头一怔。林彪在那里面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而且林彪还指名道姓地说：“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请见：《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言语之间，一脸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危急恐怖的地步啦？不敢相信，更不敢问。他们的意图就是唬得大家只能紧跟着他们“干革命”，誓死保卫这个，誓死保卫那个，什么也不要问。再没有前些天看热闹的心情了。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要出大事情了。

五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特地亲自加上了几段，其中最后一段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文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开玩笑说，毛泽东真伟大，早就看透了江青真面目。你看，他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不就是在讲江青么？）

“五一六通知”是正式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冲锋号。这个文件的形成，正是说明党内高层矛盾发展到了无法调和、无法掩饰的地步，只能大规模地公开爆发。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从哪天开始，就应该是从五月十六日开始的。

这个文件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但是，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一大批学术、文艺方面的著作和观点被强加了修正主义等大帽子，遭到公开批判。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五人小组出面干预，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想要约束文化领域过“左”的大批判，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斗争。

毛泽东认为这是在和公开对抗。3月底，他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市委！”接着，4月10日，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开始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几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五一六通知”中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现状，混淆了矛盾性质，它说明毛泽东自1957年夏季以来逐渐形成的“左”倾错误观点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第二个动作，就是这次五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还觉得各地动得不够，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和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堡垒。

有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有的说，是从六月一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从群众的直接感受来讲，是那一天。有的说，应从五月十六日算起。还有说是在更早，1965年底发表姚文元文章就算开始了。应该说，“文革”是有个分为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如果实在要说是从哪天开始，我觉得，相对来说，以五月十六日为宜。

其实，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名不副实，这本身就是个谎言。就运动范围而言，它并不只是文化领域的革命。毛泽东已经感到仅仅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三家村”、杨献珍、孙冶方这些，已经不能解决他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才发动这场涉及党和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革命”。从运动的手段来说，它实在不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武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 （3）郭影秋进了新市委

在这波风浪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传达中得知我们尊敬的校长郭影秋，5月19日也被任命为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兼原职）并代表华北局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在人大的职务仍然保留。我们的校领导都能进入新市委了，大家听了心里都很高兴。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孙泱主持。6月2日，郭影秋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郭影秋是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因年事已高，由郭影秋实际主持工作。

然而，尽管郭影秋得到了高升，他却没有丝毫的高兴，几次推脱都推不掉。因为他看到了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下场。邓拓基本上是和郭影秋同类型的党内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郭影秋在南京大学工作时，与邓拓并称为是党内的南北两大才子。而邓拓早在1942年7月1日就在“晋察冀日报”撰写社论，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个词。然而他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秉性，却为毛泽东所不容。且不说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批评他主管人民日报是在“死人办报”，“文革”初始就成了受批判的三家村“村长”，并于1966年5月17日深夜（也有记为5月18日）自杀身亡。

毛泽东对邓拓的死有个批示。对这个批示的原文，在这儿笔者不便于写出来。郭影秋在他的“临终口述”中提到了这事。郭影秋说：“我听了这一传达（指毛对邓自杀的批示）后，顿时不寒而栗。我参加革命以来，对毛主席可以说是出自内心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服，而他对邓拓之死的批示，却使我大感意外，怎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对待一个已经死去的、多才多艺的，即便是犯有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呢？”（请见：《往事漫忆》，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而叫郭影秋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就是去填补邓拓死后的空缺，怎能不叫郭忧心忡忡，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顿时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可是没多少日子，便又来了个谁也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新市委也不新了。郭影秋在这个位子上才干了两个月，就被撤职。其原因是，康生一开始对郭是抱有希望的，几次的拉拢争取，但是郭影秋明显不愿意追随极左势力而被打倒。

那个新市委的一把手李雪峰也在不久后的8月16日被罢了官，后来又因林彪事件被开除了党籍。6月18日，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潘多拉魔盒被无可挽回地彻底打开了，被放出来的极左妖魔就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猖獗，而无人可以制止。

□ 原载《风霜雨雪忆年华》，漓江出版社，2012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